

水神萧公信仰的形成与地域扩展*

王元林 郭学飞

萧公信仰肇迹于江西新淦大洋洲，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历史上萧公信仰的形成与新淦的自然环境、萧氏宗族密切相关。明代萧公神在与国家、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中获得两次国家加封赐号，使自身演变为国家正统神灵。伴随着萧公神地位的不断提提高，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萧公信仰开始对外传播，地域扩展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萧公神成为民众广泛奉祀于江河湖泊的一位水神。

关键词：萧公信仰 国家赐封 地方社会 地域扩展

作者：王元林，1968年生，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学飞，1986年生，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目前学术界对妈祖、南海神等水神的研究已很深入，而对遍祀于江河湖泊的水神萧公，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见^①。现存的《大洋洲萧侯庙志》是一本对萧公神记载的专志^②，书中收录的材料对我们揭示萧公成神及演变的过程作用重大。本文首次对萧公信仰进行系统研究，拟从萧公信仰的形成、地域扩展入手，展示地方神灵如何演变成国家正统神灵的过程以及神灵塑造与地域扩展的原因，敬请方家赐教。

一、萧公信仰的形成与祖先崇拜

萧公信仰肇迹于元代江西临江路新淦州，其祖庙在新淦大洋洲（今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镇），其神祇包括萧氏祖孙三代——伯轩、祥叔、天任。萧公信仰的产生与其宗族势力密切相关。现依《大洋洲萧侯庙志》所载的萧侯世系，将萧公神三世谱系梳理如下^③：

萧伯轩，生于宋咸淳八年（1272）十月初三日，娶吉安永新坪上刘氏，死于元大德十年（1306），葬新淦社山。其先祖本为开封祥符人，其父萧兰芳官至吉安路刺史，后卒于吉，萧伯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祭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批准号：08BZS042）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潘铭燊：《郑和的保护神：萧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孤本〈大洋洲萧侯庙志〉中的一条稀见资料》，《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8~51页；唐庆红《大洋洲萧侯庙志》及其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01期，第92~97页。

② 《大洋洲萧侯庙志》有四种版本：天启、道光、宣统、民国，也称《大洋洲萧侯庙志》，简称《萧侯庙志》。后三种版本增加了清人对萧公的相关记述，本文以清宣统三年刻本为依据。

③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一《萧氏世系图》，清宣统三年刻本，第3~4页。

轩遂留寓吉。后伯轩从吉安永丰迁徙至临江新淦大洋洲定居，生二子一女，二子为祥叔、瑞叔。

萧祥叔，伯轩长子，生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四月初二日，亦娶吉安永新坪上刘氏，卒于元至正九年（1349），葬于新淦社山。其子二：天佐、天任。

萧天佐，祥叔长子，生于元至大四年^①五月初五日，配吉安永丰水南江氏，歿于吴元年（1367），葬于新淦社山。天佐有二子：聿修、敬修。

萧天任，祥叔次子，生于元泰定元年（1324），亦配吉安永丰水南江氏，卒于永乐三年（1405），葬于新淦社山。天任无子，由天佐次子敬修过继，有三女，莲湖李伯良入赘其长女。

萧公神包括萧氏三代，最早在洪武年间就有萧氏成神的记载，翰林院编修张美和《修德堂记》云萧伯轩、萧祥叔、萧天佐三世已“有声江湖间”，歿后“人皆像而祀之”。^②如果这样的记载可靠的话，说明至少在洪武年间萧公神已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这里提到的萧氏三世中并没有孙辈萧天任，而是萧天佐。这篇记文是由萧天佐的儿子萧聿修请张美和写的，由于张氏与聿修先祖是莫逆之交，张氏无法推辞才撰此记文。而张美和死后，萧天任“为之助襄事”^③，可见两家关系密切。至明宣德十年（1435）广东按察司僉事曾鼎撰《新淦萧侯庙碑记》载萧伯轩“不事家人生业，惟以济人利物为务，晚有神识，事皆前知”，死后立庙于家，被乡人祀为水神。其子祥叔增修父道，更复神异，“往往能拥护舟楫于江湖风浪之间”，死后合祀于伯轩庙。其孙天任“生有灵异，人有所叩，无不前知”，于永乐三年（1405）坐化，亦合祀于伯轩庙。^④其后相关碑记对萧公神三世的记载亦与此相类似，只不过附会的成份越来越多。看来萧公庙本为宗室庙宇，是萧氏子孙祭祀先祖的地方，此后萧天任取代了萧天佐，同其祖伯轩、父祥叔合祀一庙中。而萧天任如何顺利取代萧天佐，这背后可能有深层原因，因史料有限，在此不作妄测。

萧公庙既为萧氏宗庙，萧公神又如何成为当地民众崇拜的神灵呢？这应与新淦自然环境相关。新淦“据豫章上游，当处虔广之冲，为江省要邑”^⑤。赣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水陆要道，“大洋洲当赣江千里中流，萦回襟带，独据形胜。”^⑥新淦“本闽粤嚆喉，自吉赣以下，素称险地，民驾缘舟子渔利，遂多不测”。^⑦新淦水道多险，不利于船只的航行。正是这样的水患环境，为历代萧公死后成为水神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萧公显灵的事迹中就出现了许多“救江湖舟楫之险”的故事。这样一方面可以迎合民众寄托于神灵来保佑航行安全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可满足民众祈求神灵平息当地水害的心理需要。由于萧氏祖孙宗庙“当横流之中”，地处赣江要道^⑧，利航运平水患等神异事件不断发生，人们自然将其认为是萧氏祖孙阴佑所致。而宗族势力的介入也为其信仰的形成与扩展帮助甚大。萧氏“世居淦之大洋洲，为洲之右族”^⑨，明人金幼孜曾言：“吾新淦自宋元以来多大家硕族，而白马萧氏其一也。”^⑩白马与大洋洲隔江相望，且入赘于萧氏的莲湖李伯良也是白马人。虽然不能确定大洋洲萧氏与白马萧氏有何关联，但萧氏作为地方大族，是主导地方的势力之一，为地方社会接受一位萧氏神灵奠定了一定基础。

有关萧公祖孙三神在元代以及明初的情况，后世的记载颇多，但附会成份也不少。在各碑记中都记载了萧伯轩在元代至大二年（1309）获得“五湖显应真人”的封号和萧祥叔在至顺五年

① 元代无至泰年号，从时间上考证应是至大四年（1311）。

② （明）张美和：《修德堂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15页。

③⑥ （明）张克文：《萧侯灵异集前序》，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12页。

④ （明）曾鼎：《新淦萧侯庙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1~2页。

⑤ （明）朱珪：《城隍庙记》，载（同治）《新淦县志》卷一《地理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第480页。

⑦ （清）戴衢亨：《杨黄捐资义渡记》，载（同治）《新淦县志》卷一《地理志》，第519页。

⑧ （清）刘珙徵：《募修大洋洲萧公英佑侯王石岸疏》，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七，第8页。

⑨ （明）卢因侃：《蜀涪州萧公庙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9页。

⑩ （明）金善：《金文靖公集》卷七《萧氏行乐图诗序》，（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555页。

(1345)获得“永灵神化普济显德舍人”的封号,但并没有提到加封的具体事迹。^①同时代的史料都未见类似的记载。明《垄起余闻》记载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萧公神在鄱阳湖大战中帮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朱元璋登基后命“沿江州县各立庙祀之”。^②明万历时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则叙述了萧公祖孙三代生前正直死后成神的事迹,其中萧祥叔任灵阳主簿时因防盗贼不屈而死,萧天任为白沟河巡检司巡检时死于王事。^③这样的神迹显然是根据一些史实附会而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兵部尚书郭子章《三萧侯传》中增加了萧伯轩访道临江谢真人一事和萧祥叔洞庭湖显灵护舟与助伯颜南征的事迹,并美化了萧氏成神的过程,使萧氏成神开始与道教的洞天福地阁皂山和玉笥山产生了联系,借道教来渲染萧公成神的神秘化。^④由于其间时间相隔较长,可信度不高。而值得注意的是,各碑记中都提到了萧祥叔在明初朱元璋营建宫室过程中显灵护运的神迹,并受到了朱元璋遣官谕祭的礼遇。而明官方志书中亦有“国朝洪武初,尝遣官谕祭”^⑤的记载。结合张氏记文,可以认为萧公神初次引起明朝统治者注意后,萧聿修请张氏作记文来进一步确立和抬高萧公神的地位。由于记文中没提到萧公祖孙三神在元代的相关事迹以及所获的封号,这与萧公庙本为家庙,当时还未成神格相关。至明初时,萧公神因不断灵异而引起朝廷重视。故萧公前二世伯轩、祥叔在元代的事迹多不可信,萧公神真正发迹是从明永乐时萧天任开始的。

二、明代萧公神获得两次国家赐封与地方社会

萧公信仰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须从地方神灵升格为国家正统神灵。在永乐年时,萧公信仰的发展迎来了重大转机。成化二年(1466)临江府新淦县官员为祀萧公神之事的《勘合》中提到:“永乐十七年(1419),朝廷曾差内臣往西洋等处公干,节被风波险难。萧公之神,即于海上云中现影,救护海舟,得脱险难。内臣使还具奏,文皇帝敕封英佑侯。”^⑥《明英宗实录》亦载:“神自永乐中已封为英佑侯。”^⑦上述曾鼎碑记中亦有“神游海上锡侯封”之句。而此处萧公神指的是萧天任,说明了萧天任在海上显灵,并在内臣的请求下,明成祖加封萧天任为英佑侯。相关史料都言及萧天任此次受封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有关,但其受封的具体事迹并不是很清晰。另据乾隆《腾越州志》载:“时有内臣事海外招诸夷,临江水工多调发,过风水则拜呼萧公,则验。太监郑和归,入奏,遂加封修庙。”^⑧这些水工信仰的水神在海上显灵庇佑航行,得到朝廷封号自然顺理成章,这与天妃在宋宣和年间显圣获封的事迹相似。

景泰四年(1453)萧天任再次得到加封赐号。《敕谕水府萧公英佑侯》中提到萧天任“西洋济险,先朝已锡于荣封,兹特加封神为水府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⑨。此次加封的缘由是“景泰三年,(武冈州、靖州)苗复为叛,英佑侯萧公之孙萧鸣、祀神之人王灏告称,因神附体降鸾,

① (明)金辅伯:《新淦萧侯庙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4页。

② 乾隆《枝江县志》建置志第二《寺庙庵观》,引乾隆五年刻本,第28页。

③ (明)罗懋登撰、陆树仑、竺少华点校《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二十《水族各神圣来参 宗家三兄弟发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85页。

④ (明)郭子章:《大洋洲三萧侯传》,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二,第1~6页。

⑤ (明)《寰宇通志》卷三十七《临江府·祠庙》,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10页。

⑥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三《勘合》,第2~3页。另见康熙《新淦县志》卷十五《杂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第1015~1022页。

⑦ 《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九月己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5098页。

⑧ 乾隆《腾越州志》卷四《坛庙》,引光绪二十三年重刊本,第17页。

⑨ (明)陈循:《芳洲文集续编》卷一《代言》,见《续修四库全书》(132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报云：‘已遣神兵助行招抚’。……神祝王灏将神香钱二百两买米及盐运赴军前接济官军。军纳交后，苗各闻知神明运助粮储，互相诱化，不复为恶。……都御史李（实）备由具奏。”^①此次萧天任显灵护运漕粮有功而受封。同样，《明英宗实录》载：“加水神萧公封号为水府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至是，巡抚湖广都御史李实言：‘近岁，神降于其乡人王灏，附鸾箕以言祸福，有验，乞加崇奖。’于是，降敕加封号，而赐灏冠带终其身。”^②而在《勘合》中把萧天任受封的整个过程记述的更为详细，“有验”当是李实奏称“访得萧侯之神于川广之间，果有灵验，无妄言。”而且李实还将王灏用神香钱买米粮接济官军以及备木造桥等事迹上报，翰林院据此定拟“褒嘉神号”，再由礼部核准颁布。^③而需要注意的是，“水府”一般是水神的通称，不应是封号，且从敕谕中称萧公神为“水府萧公英佑侯”来看，此次加封增加的是“灵通广济显应”六字。萧鸣和庙祝王灏用萧公庙的香火钱买粮造桥来支持官军运粮，并假称是受了萧公神的指示。显然萧公神此次获得国家加封既体现了萧氏宗族势力的作用，又折射了地方神祇通过地方叛乱中的作用而成为国家正统神灵的过程。

随着萧公神地位的提高，景泰七年（1456），因大洋洲的萧公庙宇“不足以展祀事”，于是萧氏子孙捐貲买巨木，并在旧祠前择地创庙宇，规模壮观，“以安侯三世之神”。成化二年（1466），太常寺卿邓常恩奏称：“萧公英佑侯之神，屡著灵显。”^④邓常恩是临江籍道士，深受皇帝宠信，故户、礼二部命“浚邑支官钱”修萧公庙，“春秋随宜备物，遣官致祭，岁以为常”^⑤，所花的费用是“银四两六分二厘”^⑥，并拨中户人二名来维持萧公庙的日常运转以及负责打扫庙宇。而政府也免萧氏子孙杂差，“粮与轻贲”。^⑦国家赋予萧公神后代特权，刺激地方宗族势力参与到萧公信仰中来。

更为重要的是，萧公庙的香火很旺盛，从“每年恒有数百金寄回，家赖以给”来看^⑧，萧公庙所得香火钱是十分可观的，那么取得萧公庙宇的管理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萧公庙中“所入香楮金钱，则萧、李两姓资焉”^⑨，可见萧公庙宇的管理权由萧、李两姓负责，李氏则是萧天任长女赘莲湖李伯良的一支。而其内部又有细分，萧氏从“祥叔、瑞叔两公派分三房，上房、中房出祥叔，下房出瑞叔，李氏一房。每月每房输六日值侯祠，香火香钱所入，除修葺祠宇外，余以资六房。”^⑩萧、李两姓除参与萧公庙管理外，也用庙中香火钱来参与地方建设。萧公庙“当大江之冲”，其庙基关系到乡人免受水患的威胁。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两姓中有识者谓，祠岸倾危，几及堂寝”，并请里中长者张君、邑侯朱公、邑缙绅侍御史朱谨吾倡修庙堤，捐貲助修，萧、李两姓子孙也出钱出力。越一年庙堤成，“砌岸高三丈有奇，延袤几百丈有奇”，所费四千余金，其中萧公庙的香火钱就占很大一部分。^⑪此次萧公庙堤修成后，成为当地不受水害的保障，乡人也认为是得到萧公神保佑，直至清代才加以重修。

①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三《勘合》，第2页。

② 《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九月己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5098页。

③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三《勘合》，第3页；另见乾隆《武进县志》卷二《桥梁》，乾隆三十年刊本，第19~20页。

④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三《勘合》，第6页。

⑤⑩ （明）甘应蚪：《萧侯神迹纪》，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二，第11页。

⑥ 《隆庆临江府志》卷七《赋役》，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35），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19页。

⑦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三《勘合》，第4页。

⑧ （明）王圻：《稗史汇编》卷133《祠祭门》，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42），齐鲁书社，1997年，第91页。

⑨ （明）邱士毅：《金川英佑侯萧公庙堤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6~7页。

⑪ 同上，第7页。

三、萧公信仰日隆与地域扩展

从萧天任在永乐十七年封为英佑侯,到景泰四年再次加封为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萧公神得到国家承认,这对其信仰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萧天任也由人物升格为有功于国家与民众的神灵,登上了国家正祀的舞台,故明代几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毁淫祠活动中并没有发现有打击萧公神的案例。伴随着萧公神地位的提高,有关萧公的神职愈趋多样,萧公信仰也日益兴盛,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它地区。

宣德十年曾鼎的碑记记载了萧公神三世的身世、神力及其获封的情况,并提到了萧公神的神职是护佑乡人商游和江湖行舟者,“水旱疾疫,有求则应”,尤其是在川蜀、江淮间。^① 景泰七年金辅伯的碑记则赋予了萧天任“广颖修髯,聪明正直”,对经史过目不忘的形象,显灵的地点扩大至“川蜀、湖湘、江淮、吴越”,其神职除保舟楫、水旱之外,还有“保军民运输”,^② 开始与漕运联系起来。成化年间,人们又增加了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被俘之后萧公神显灵安定民心的神迹,萧公神职从护佑四川、两广、两浙、两淮、黄河地区的官船、军船、客商等船只的航行安全,并扩展到保佑国家社稷安定。^③ 弘治年间,李东阳作诗云:“南船北船满洞庭,萧公祠前牲酒馨”^④,可见萧公神已成为洞庭湖的保护神。正德年间,御史高公韶巡抚江右时刻印了《萧侯灵异集》。万历年间,大夫、南北商旅、长年舟师、妇人女子、缙绅学士、文人骚客都会“肃衣冠”拜谒萧公庙。^⑤ 而且“舟行湖湘、川蜀、江淮、吴越诸水乡,必载神像虔奉之。”^⑥ 谢肇淛《北河纪》载萧公神已成为黄河下游官方祭祀的水神之一。^⑦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兵部尚书郭子章为报答萧公神阴佑至高官,亲自揖录了《大洋洲萧侯庙志》一书,还为萧公三世作了传,传中新增了万历二十七年夏萧天任显灵治病且所活者甚众一事。虽然海内江浒都奉祀萧公神,但此时形成了新淦大洋洲、涪陵李渡、京师萧公塘三个祭祀中心,^⑧ 而这些地方都处于水运显要地段。

郭子章揖的《大洋洲萧侯庙志》内容丰富,书中收录的记文都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官员或学者所作,足见萧公信仰在当时的影响力。该庙志对提高萧公神的知名度有很大作用,也有助于萧公信仰向更广范围外传播。但在明代除庙志外,众多文人笔记中也有相关萧公神显灵事迹。如明朱孟震《浣水续谈》载:江西太和人袁茂文坐船回家为父亲祝寿,在江中遇盗匪跟随,后在萧公神的帮助下制服了盗匪。^⑨ 戴冠《濯缨亭笔记》云:洪武初昆山山人归叔度因避事携家人赴四川,在萧公神的指引下渡过各种艰险而顺利抵达成都。^⑩ 王圻《稗史汇编》载:“凡年长黄帽事之最谨,而兵卫将士及漕运官军尤极诚笃,闻外夷之人亦奉祀之。”^⑪ 可见在萧公信仰的崇拜中

① (明)曾鼎:《新淦萧侯庙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2页。

② (明)金辅伯:《新淦萧侯庙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4页。

③ 《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三《勘合》,第3页。

④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九十一《长沙竹枝歌十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71页。

⑤ (明)张克文:《萧侯灵异集前序》,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13页。

⑥ (明)邱士毅:《金川英佑侯萧公庙堤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6页。

⑦ (明)谢肇淛:《北河纪》卷八《河灵纪》,见《文津阁四库》(192),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3~64页。

⑧ (明)郭子章:《大洋洲三萧侯传》,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二,第5页。

⑨ (明)朱孟震:《浣水续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04),第718~719页。

⑩ 戴冠:《濯缨亭笔记》卷五,见《续修四库全书》(1170),第462、463页。

⑪ (明)王圻:《稗史汇编》卷133《祠祭门》,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42),第91页。

还有道士和军队两种职业的群体。另外,在明朱孟震《河上楮谈》还载有“萧公铁锚记”“张克文起死回生”等萧公神迹^①。总之,明代有关萧公神显灵事迹层出不穷,奉祀萧公神的群体也涉及到各种社会群体,而萧公的神职都与护国佑民联系紧密,如上司国命、护漕运、保安宁,下佑民生、护商旅、保舟楫。萧公信仰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赣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再扩展到黄河流域,正如谢肇淛言:“江河之神多祀萧公”^②。

此外,萧公神不仅成为临江的地方保护神,也成为江西的区域保护神。明代江右商帮迅速崛起,江西商人在外建立的江西会馆除祀许真君外,一般也会奉祀萧公神。顺天府萧公堂为江西公所,明万历间建,“祀鄱阳湖神萧公”。^③特别是临江商人更视萧公神为自己的保护神,在外建立的会馆一般都称为“萧公庙”、“萧君祠”“仁寿宫”等,而且江西会馆又有称“水府庙”、“水府祠”,并奉祀水神萧公。^④正如林俊言:“水江之舟多祀焉。听夕撞鼓磬为乐,发必告,止必报。”^⑤王士性也曾说:“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⑥说明了在明代萧公信仰的影响力已广泛扩展到江西以外地区。

清代,国家未对萧公神再加封赐号。虽然在曹启华撰《吴西众商建修万寿宫暨水府殿记》中提及“乾隆二年(1737)勅封仁寿萧公”一事^⑦,但此说并不可信,查《大清会典》等相关史籍并无萧公神受封的记载。而地方势力谋求突显萧公神影响力的努力并没有放弃,相关萧公神新的显灵事迹就是明证。清顺治十八年(1661),差官王基标、刘神武奉令前往临江府采伐樟树,欲砍伐萧公庙前的三十余株,萧公神托梦于差官和新淦县官言“庙系江中砥柱,树乃护庙根基,不可砍伐”,事后这些官员同在萧公神像前三次占卜祷告,皆被告知不可,朝廷只好“另行采买补数”。^⑧康熙六年(1667)分守湖西道官员施闰章携家北行,为避免受秋冬季鄱阳湖盛行北风的影响而耽误行程,施闰章亲自到大洋洲的萧公庙中祷于神,“乞风以济”,并答应愿为萧公神作庙铭。后果灵念,施闰章也在康熙八年(1669)作了《大洋洲萧公英佑侯庙碑文》以示酬谢。从碑文中看,萧公神已成为了鄱阳湖的湖神。“事官临江者,始至谒晏,去则祠萧。……凡郡吏、民有事于江淮、河北、四方之役者,必先齐戒趋大洋洲,卜吉以往。”^⑨许纘曾亦言:“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萧、晏,如黄河之祀金龙四大王。”^⑩张寿南也说:“以公车之役曾泛彭蠡、渡黄河,经分水渚,凡掀胜勃怒危险万状之处水神庙中,罔不祀侯焉。”^⑪可见在清初,萧公信仰仍然较广。至清中后期后,本为三世并祀的萧公庙,转变为专祀萧天任。饶学澍言:“三世俱为水神,而侯之功德尤甚,其专祀也。”^⑫这样的原因亦如他所言:“侯之功德最高,神迹更著。”^⑬同时,各处在萧公诞辰的农历四月初一日^⑭也形成了萧公庙会。杨世锐言:

① 《朱秉器全集六种》,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7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1~282页。

②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③ 《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四《坊巷下》,第二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④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7页。

⑤ (明)林俊:《见素集》卷二十八《舟神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

⑥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中华书局,1981年,第86页。

⑦ (清)曹启华:《吴西众商建修万寿宫暨水府殿记》,载乾隆《湘潭县志》卷二十四《艺文志》,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43页。

⑧ (清)张为:《显应灵梦》,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七,第17页。

⑨ (清)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二十,见《文津阁四库》(438),第508~509页。

⑩ (清)许纘曾:《东还纪程·续抄》,见《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3页。

⑪ (清)张寿南:《萧公英佑侯庙堤疏》,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七,第7页。

⑫ (清)饶学澍:《重刊萧侯庙志跋》,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八《跋》,第2页。

⑬ (清)饶学澍:《河口新建仁寿宫落成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八《补刊》,第1页。

⑭ 《增补选择通书广玉匣记》卷一《三元五腊圣诞日期》,广盛堂藏板,第13页。

“予家距侯故居洋洲仅二里许，每孟夏诞辰未尝不具牲礼申祷祀焉。”^①涪州“每年四月初一日阁会，演戏恭祝神诞。”^②而清初新淦地方官每年祭祀大洋洲萧公庙的费用是“银二两六分二厘”^③，清中后期对萧公神的祭祀年费用与祭祀练公祠、黄勉斋祠合计“五两三钱三分八厘”^④。

四、萧公信仰地域扩展的原因

萧公信仰的地域扩展，是诸多原因导致的结果。

交通环境对萧公信仰的扩展有一定的影响。前文已述及萧公信仰起源地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从交通环境看，元傅若金言：“新淦据江右上游，凡仕于南及四方游士、商贾之过焉者，舟车日不絕。”^⑤明邓元锡亦言：“地当舟车四会之衢，山峻水清，逐末者多。”^⑥正是处水陆交通要道，人口往来频繁。大洋洲萧公庙又为“车马之所往来，行旅之所鳞集”之地^⑦，“宦游旅泊，道出神祠，靡不齐心祈祀。”^⑧这些条件为扩大萧公信仰的知名度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移民对萧公信仰的扩展也有一定影响。明代江西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现象，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代，自有“江西填湖广”一说。但明代江西移民并不只是迁到湖广地区，在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地区都有大量的江西移民。这些移民迁居到新环境中，往往也会带去家乡的文化，包括家乡的神灵。如云南通海县^⑨、蒙化^⑩、镇南州^⑪等地的萧公庙都是明清时期江西移民所建立。这些修建庙宇的地方也反映出江西客民移居此地区的人数是比较密集的。

商人对萧公信仰扩展的影响。上文已提到江西商人在外建立的会馆也会奉祀萧公神，显然萧公神已成为江西人在外联系乡人的纽带。明代江西商人的势力相当庞大，江西商人的足迹更是遍及全国。王士性言：“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⑫这些商人在外行商时，一方面会利用家乡神灵来联系乡情，一方面也会借家乡神灵来慰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此时期萧公庙宇在外地的兴建就与江西商人有很大关系。铅山河口仁寿宫专祀英佑侯，修建的资金除在该地临江药商和茶商敛货集修外，还从往来玉山的货物中抽取厘金。又如湖南武陵^⑬、四川峡江^⑭等地萧公庙的建立都与商人密切相关。

政府官员对萧公信仰扩展的影响。地方官员在各地任官时，时常会在任职地修建庙宇。这样做的目的既体现了这些官员想利用神灵来推行教化以便于对当地社会管理的心境，又与自己个人的经历有关。如正统初知府陈本深在吉安建立了萧公庙^⑮，而这与此前陈本深任职新淦有很大

①（清）杨世锐：《萧公英佑侯传》，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八《补遗》，第1页。

② 乾隆《涪州志》，见《四川府州县志》（12），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③ 康熙《新淦县志》卷六《赋役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第277页。

④ 同治《新淦县志》卷三《食货志》，第950页。

⑤（元）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三《高远堂记》，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92），第697页。

⑥（明）邓元锡：《函史》（下编）卷二《方域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7），第586页。

⑦（清）张寿南：《萧公英佑侯庙堤疏》，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七，第6页。

⑧（明）邱士毅：《金川英佑侯萧公庙堤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四，第6页。

⑨（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七十五卷《临安府部·汇考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43页。

⑩（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五百八卷《蒙化府部·汇考二》，第16页。

⑪ 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寺观》，见《西南稀见方志文献》（28），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

⑫（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中华书局，1981年，第80页。

⑬（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常德府部·汇考五》，第3页。

⑭（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六百二十九卷《嘉定州部·汇考三》，第35页。

⑮ 嘉靖《吉安府志》卷六《輿地志》，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31），第566页。

关系；安徽泾县萧公庙的建立缘于“明万历间沈容贤之官江西，舟被风，捞得一篋为萧公像，祈祷获安，神之归祀于邑”^①；说明了地方官员自身的经历与传播萧公信仰有密切联系。此外，地方官员在各地修建萧公庙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嘉靖间参政刘黶在四川内江县重修萧公庙，万历末同知梁宏化再修^②；河南卫辉府萧公庙由嘉靖中知府陈庆重修^③。以上说明政府官员在萧公信仰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因为这些官员任职有很强的流动性，更为萧公信仰向更广泛的区域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另外，萧公神作为水神，其职责是庇佑水上航运安全，水上从业者与萧公信仰自然关系密切。如湖南新化^④、江西高安^⑤等地的萧公庙宇都是由船户修建的。

总之，萧公信仰在地域扩展的过程中，与社会各群体关系密切。从明清方志记载的大量萧公庙宇来看，移民、商人和官员在萧公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推动萧公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明统治者对萧公神的屡屡加封，既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神灵的重视，又提高了萧公神的地位，还扩大了萧公神的影响力。正是在以上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萧公庙宇遍及广大区域，萧公信仰的影响力也曾盛极一时，出现了“凡通都巨镇、省会京师、仕宦商贾舟车往来之区，莫不立庙以专祀侯”的现象^⑥。

五、小 结

萧公信仰肇迹于宋末元初的江西新淦，所祀神祇包括萧氏祖孙三代一伯轩、祥叔、天任。早期萧公庙只是以家族宗庙的形式存在，入明后萧公信仰开始日益显著，萧公神获得了明统治者的两次赐封，萧公信仰也开始广泛传播至全国各地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清代萧公信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清初为三代合祀，转变为清中后期专祀萧天任。

萧公信仰的发展过程与地方势力密切相关。萧公信仰从祖先崇拜到地方信仰，再到区域信仰，这一过程的转变与地方宗族势力的介入深有关联。与萧公神密切的萧、李两姓都是地方大族，在争取萧公神获封、修庙等有利于萧公信仰发展的事迹中都可看到他们的积极参与。诸多文人所作萧公神的诗文中则展示了萧公神神迹的演变，从中不仅可见萧公神职愈趋全面，同时也反映了萧公信仰地域扩展的过程。而这些地方势力的介入，显然与他们追逐的利益是相关的。

萧公信仰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与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其社会各群体有很大的联系。如萧公信仰的起源地江西新淦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优势，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现象，明代江西商人的势力迅速壮大，地方官员利用萧公神推行教化，政府对萧公神的屡次加封以及赐建新庙等因素都对萧公信仰的广泛传播有很大帮助。总之，随着萧公信仰传播范围的渐广，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与萧公信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可见萧公信仰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责任编辑：于光）

① 嘉庆《泾县志》卷九《壇廟》，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第853页。

② 嘉庆《内江县志》，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5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③ 郝瑞平主编《顺治卫辉府志》，见《孤本旧方志选编》（10），线装书局，2004年，第370页。

④ （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卷《宝庆府部·汇考八》，第8页。

⑤ 康熙《高安县志》卷三《祀典》，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27），中国书店，1992年，第85页。

⑥ （清）饶学澍：《河口新建仁寿宫落成碑记》，载《大洋洲萧侯庙志》卷八《补刊》，第1页。